

台日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與實務經驗分析

余竣毅* 張芷柔* 鄒芸熹*

*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 貢獻程度相同

壹、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與日本小學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與實務經驗。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兩國的教育系統面臨來自多元文化社會結構的挑戰。本研究採用了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選取具有豐富教學經驗且曾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台灣與日本小學教師作為訪談對象。訪談問題圍繞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及其應對策略展開，並對訪談內容進行了主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與日本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與實務經驗存在顯著差異。台灣教師更強調個體差異，並通過語言教育和個別輔導來滿足學生的多樣需求；相較之下，日本教師則注重群體和諧與集體主義，透過集體活動與道德教育來促進學生的合作與理解。此外，研究還發現，台灣教師常扮演關懷者的角色，而日本教師則更多地擔任文化傳遞者。這些差異反映了兩國在教育目標與政策背景上的不同，並為未來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依據。

貳、緒論

一、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化的交融與衝突日益頻繁，這不僅在經濟、政治領域引發了深遠的影響，也使得教育領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化催生了多元文化的社會結構，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亞洲，移民流動、國際化教育、文化多樣性的增加，均使得各國不得不重新審視教育政策與實踐中的多元文化教育議題。根據 Banks and Banks (2010) 的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不僅僅是對文化差異的包容，更是對社會不平等的回應，它要求教育體系在課程設計、教學實踐、教師培訓等各個層面進行全面改革，以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和社會正義。

二、台灣與日本的教育大環境與多元文化挑戰

台灣自義務教育實施以來，隨著時代變遷，已經歷多次教育改革，這些改革不僅體現在課程設計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上，更涉及到對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與探索。台灣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社會，在教育政策上逐漸形成了對多元文化的重視。台灣現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明確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價值是培養學生對自我文化的認同及對其他文化的尊重與欣賞(教育部, 2014)。這一政策背景下，台灣的小學教師在教學實踐中，

不僅要關注學生的學業成就，更要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多樣需求，這無疑對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與台灣不同，日本在戰後長期保持著相對單一的民族與文化結構，直到近年來，由於移民政策的放寬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逐漸進入日本的教育體系。這使得日本的教育現場開始面臨多元文化教育的新挑戰。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7）的報告，日本在應對多元文化教育問題上，更多地依賴道德教育的框架，希望通過道德課程來培養學生的國際理解與文化尊重。然而，由於日本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這種教育模式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諸多困難，例如如何在強調集體和諧的同時，保護學生的個體權益等。

三、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與研究動機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源自於社會學、教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研究。Durkheim (1956)提出，教育是一種社會化過程，教師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引導角色，通過教育將社會價值和規範傳遞給年輕一代。Parsons (1968)則進一步強調了學校作為社會系統的功能，認為教師在班級管理中，既是社會化的代理人，也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

然而，隨著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教師的角色日益複雜化。Freire (1998)在其著作中指出，教師不僅應該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應該是文化的工作者，能夠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並推動社會變革。這一觀點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定位：教師應如何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同時，維護教育機會的均等？如何平衡個體差異與集體和諧？這些問題構成了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四、研究目的與架構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通過質性訪談的方式，深入探討台灣與日本小學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與實務經驗。本研究將聚焦於以下四個方面：語言教育、班級經營策略、教學策略以及教師角色的展現，並試圖通過比較兩國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差異與共通點，為兩國未來的教育政策與實踐提供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訪談設計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採用了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訪談對象為台灣與日本的小學教師。這些教師均具有專業的教學經驗，並且在其任教的學校中，

曾經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因此，他們的經驗與觀點對於理解台日兩國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異同具有重要意義。

訪談問題的設計基於兩個核心研究問題：

1. 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台灣與日本小學教師的教師角色有無差異？
2. 台灣與日本的小學教師如何應對多元文化學生，使教育機會均等？

這些問題涵蓋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層面，從教師的角色認知，到具體的教學策略與班級經營方法，旨在全面了解台日兩國教師在實務中的操作與挑戰。

二、訪談實施與資料分析

訪談的進行時間約為 45 至 60 分鐘，所有訪談均經過同意後錄音，並進行逐字稿記錄。本研究首先對逐字稿進行了初步閱讀，標記出與研究問題相關的關鍵詞與句子。接著，通過比較不同受訪者的回答，識別出共同的主題與差異，最後對這些主題進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台日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與實務經驗。

肆、結果

研究問題一：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台灣與日本小學教師的教師角色有無差異？

根據訪談資料的分析，我們發現台灣與日本的小學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教師角色存在顯著的共通點與差異。

首先，無論是在台灣還是日本，教師都認為自己在班級中扮演著「調停者」的角色。這一角色主要體現在教師需要在學生之間發生衝突時介入調解。衝突的類型多種多樣，但多數與文化差異有關，例如語言或性別認同等問題。這反映了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核心功能：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社會互動的引導者。這一點與 Parsons (1968) 所描述的教師角色非常相似，教師不僅在教學中傳授學科知識，還通過日常管理來維護班級的社會秩序。

然而，台灣與日本教師在如何理解與實踐這一角色上，展現出了不同的側重。台灣教師強調「個體差異」的重要性，認為教師應該關注每一個學生的獨特需求，並在教學中提供個別化的支持。在訪談中，台灣教師提到，他們常常需要特別關注那些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例如來自低收入家庭或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並通過個別輔導、課後輔助等方式，幫助他們達到學業上的基本要求。

相對地，日本教師更注重「群體和諧」與「集體主義」。他們認為，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班級中，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與理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他們

更傾向於通過集體活動來達成教育目標，例如班級討論、文化介紹會等，這樣的活動既能增進學生之間的互相了解，也有助於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此外，台灣教師在訪談中還提到，他們經常扮演「關懷者」的角色，特別是在面對家庭背景複雜或經濟困難的學生時，教師需要在學校生活中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與幫助。而日本教師則更多地強調「文化傳遞者」的角色，認為教師有責任讓學生了解並尊重不同文化。

研究問題二：台灣與日本的小學教師如何應對多元文化學生，使教育機會均等？

在如何確保多元文化背景學生的教育機會均等這一問題上，台灣與日本教師的策略也有所不同。

在正式課程中，台灣教師特別強調語言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語言是文化的核心，通過學習多種語言，學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學。例如，台灣的許多小學會開設母語課程，讓原住民或新住民的學生有機會學習自己的母語，這既是對學生文化身份的尊重，也是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實踐(教育部, 2014)。此外，台灣教師還會在課堂上引入多元文化的教材，並設計與文化相關的教學活動，這些活動有助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接觸並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從而培養他們的跨文化素養。

相較之下，日本教師則更傾向於通過道德教育來實現教育機會的均等。他們認為，道德教育是培養學生國際理解與文化尊重的重要途徑。在日本的小學中，教師經常會利用道德課程來討論與多元文化相關的議題，例如性別平等、種族平等。這些課程不僅有助於學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同學的處境，也能幫助他們建立對文化差異的尊重態度。

在潛在課程方面，台灣教師通常會採取個別輔導的方式，針對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提供特別幫助。這種方式的目的是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夠達到基本的學業標準，從而實現教育機會的均等。例如，對於語言能力較弱或學習進度落後的學生，教師會提供課後輔導或個別指導，這既是對學生個別需求的回應，也是台灣教育政策中對積極差別待遇的體現。

日本教師在潛在課程的實施上，則更加強調集體活動的重要性。他們經常會組織學生參加各種集體討論或文化介紹活動，這些活動旨在讓學生在集體中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相處。例如，在某些學校中，教師會鼓勵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在班級中介紹自己的文化，這不僅有助於增進同學之間的理解，也能讓學生學會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合作與共存。

在特殊教育方面，兩國均推行融合教育，倡導一般生與特殊生之間的互相尊重與合作。然而，台灣和日本在具體的實施策略上仍存在差異。台灣教師認

為特殊生需要在個別化的教學環境中獲得更多的支持，這也是為了確保這些學生能夠在主流教育體系中不被排斥。日本教師則更強調在普通班級中進行個別指導，這樣的安排既保證了特殊生能夠與一般生一起學習，又能夠在特定情境下提供額外的支持。

伍、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台灣與日本小學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與實務經驗存在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與兩國的教育目標和政策背景密切相關。

一、台日教育目標的對比與教師角色的差異

首先，台灣的教育政策強調個體差異與積極差別待遇，這使得台灣教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更多地關注學生的個別需求，並且在教學策略上注重語言教育和個別輔導。這與台灣教育目標中強調的「尊重多元文化」和「促進社會正義」的理念一致。教育部（2014）提出，通過多元文化教育，學生應該能夠理解並尊重不同的文化背景，並具備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此，台灣教師在教學中，常常會根據學生的個別需求來設計課程與活動，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夠獲得均等的教育機會。

與此相對，日本的教育目標則更強調群體和諧與集體主義，這反映在日本教師的教學實踐中，特別是他們傾向於通過集體活動來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與理解。文部科学省（2017）強調，日本的道德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國際理解能力，並且希望通過道德課程來引導學生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這種集體主義的教育模式，雖然有助於促進學生之間的團結與合作，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忽視個體的特殊需求，這也是日本教育面臨的一個挑戰。

二、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教師角色：理論與實務的融合

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教師更多地強調了個體差異的重要性，並且通過個別輔導、語言教育等方式，來滿足學生的多樣需求。這與Freire（1998）的理論相吻合，即教師應該關注並回應學生的多元需求，並在教學中促進文化的理解與尊重。相對地，日本教師則更多地強調集體和諧與文化傳遞，這與日本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相一致。

三、實務意涵與政策建議

基於本研究的結果，台灣與日本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差異，不僅反映了兩國不同的教育目標與政策，也展現了兩國教師在面對多元文化挑戰時的不同策略與經驗。這些差異對於未來的教育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於台灣而言，未來可以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對多元文化教育中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特別是在如何有效應對學生的個別需求方面，提供更多的培訓與資源。同時，政策制定者也應考慮到，如何在保障個體權益的同時，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與理解，這需要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中，找到個體差異與集體和諧之間的平衡點。

對於日本而言，如何在維護集體和諧的同時，關注學生的個體需求，是未來教育改革中需要重視的課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引入更多的個別化教學策略，例如在普通班級中加強個別指導，並且在道德教育中，更加強調對個體差異的尊重與包容。此外，日本的教育系統也可以借鑒台灣在語言教育方面的經驗，特別是在推動多語教育方面，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支持。

整體而言，台灣與日本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實務經驗，展示了兩國在應對文化多樣性挑戰時的不同策略與取向。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這些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效性，並且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探索多元文化教育的最佳實踐模式。

參考文獻

- Banks, J. A., & Banks, C. A. M. G. (2010).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Wiley.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e1ITbOA2jhQC>
- Durkheim, E. (1956).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Simon and Schuster.
- Freire, P. (1998). *Teachers As Cultural Workers: Letters To Those Who Dare Teach*. Avalon Publishing.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AA6cAAAAMAAJ>
- Parsons, T. (1968). *The School Class as a Social System: Some of Its Fun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kbE4twAACAAJ>
- 文部科学省. (2017). *小・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
- 教育部. (20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臺北市: 教育部.